**鲁迅乡土小说视角特征的文化生态学考察**

马海娟1，李尔东2

[摘 要]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在乡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以深切地“关注人生”、“启蒙主义”和“疗救病苦”为目的，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孜孜不倦地批判解着破旧的历史，呈现出解构的创作视角。现代文化生态学是受生态学影响而兴起的一个学科，认为文化成与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鲁迅乡土小说的视角成因进行一番疏分析，以期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 视角；解构；文化生态学；地域文化；童年记忆；教育经验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在乡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以深切地“关注人生”、“启蒙主义”和“疗救病苦”为目的，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孜孜不倦地批判和拆解着破旧的历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时代性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为什么致力于乡土小说创作的鲁迅的故乡情怀不是眷恋，而是离弃，对于乡土文化不是建构，而是解构呢？有充分的事实证明，鲁迅对农村题材的态度不是偶然发生而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这种倾向性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作家主观因素和外部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地域文化、童年记忆、教育经验则起着十分重要的隐性或显性的作用。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其中的成因进行一番疏理和分析，以期获得较为全面地认识。

现代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的生成与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环境，包括由自然环境、物质生活环境,以及由语言、思想、观点、理论、制度、伦理、风俗、文学艺术、大众传播等构成的精神生活环境。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学创作也不例外。就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而言，地域文化、童年记忆和教育经验等则其者十分中要的隐性或显性的作用。

一、地域文化

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地理位置和自然疆域内形成的、具有强烈区域特征和明显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系统。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他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必然会打上深刻的地域烙印。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卓有成效的小说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文学的永恒正取决于作家对这块土地独特的文化风俗和生活底蕴的审视与表现，具体到鲁迅就是浙东文化。

鲁迅出生于江南水乡，就人文地理环境而言，吴越一带水域丰富，水涝灾害常有发生，古吴越人民为了生存而同自然进行斗争,造就了尚力、好斗、坚韧的民风,呈现出激烈的一面，这种“激烈”与反抗的精神特质在代代相沿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强化。鲁迅在继承吴越文化精神反抗的共性的同时，更敬仰“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和“倔强的魂灵”，在黑暗、虚无的绝望中坚持反抗和独立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出对“激烈”一脉的承继。在南京求学的时候，鲁迅很爱骑马，每天都要跑一两个钟头，还开始使用“戛剑生”“戎马书生”等别号，甚至刻了“文章误我”的印章，行为上有浓重的尚武之气。他以“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放达任情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立场，镌刻着“激烈”的文化品格。在思想倾向上，鲁迅更喜欢孔融、嵇康，欣赏他们那种私立不羁的人格，充满叛逆的文化气质。早年鲁迅是深深热爱和沉浸于这样的文化中的。

在政治上，浙东是一块近代以来得风气之先、但骨子里依然浸染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地。以儒、释、道精神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维系着这个传统的社会，它注重克己修身来迁就外部世界，以改变和抑制自己去适应和维持不变的社会秩序。倘若说封建制度是从外在的强制性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话，那么，封建伦理道德则是从内在的服膺性达到宗法社会的稳定，它渗入乡民们的血液中，成为他们的生活信念和行为规范。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文化氛围中成长的。而新文化的熏陶、新理念的接受,新思想的影响，使鲁迅逐渐地认识到，这是一种“吃人”的文化，它的吃人性是建立在不承认人的个体性、不承认人的独立性、不承认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权利之上的。它不是把人视为社会的“公民”，而是必须要求人成为社会的“顺民”，而这种“顺民”则是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顺从权利的人。这种文化以其惊人的威慑力量窒息着社会的精神活力和创造精神。鲁迅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猛烈抨击封建旧文化的残酷性和虚伪性，揭露它的吃人的本质，以唤醒民众，改变国民的精神。

二、不同的童年记忆

童年时期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时期，作家“在孩提时代的内心激情”基本上决定了“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少年时代的“感性和理性生活”极大地制约着其后创作的发展方向。[2]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族，有数百年历史的名门望族“台门周家”在道光年间开始的政治、经济地位的衰落，引起了家族生活的巨大变化。种种败落和惨淡的景象，在鲁迅的内心深处投上了浓重的阴影。特别是祖父的“科场贿赂案”发生后，为保全祖父，就年年变卖土地和家产，家业所剩无几。父亲周伯宜因此精神萎靡，随后身患重病，常常口吐狂血、精神反常，无缘无故地受到惊吓，变得神魂不安。作为长子长孙的鲁迅一面要承受这生活变故的打击，一面还要为孤立无援、煎熬万端的母亲分忧。期间，祖父的“科场贿赂”案发生后，全家惊恐万分，深怕受到株连，鲁迅便随着母亲和弟弟逃到乡下的舅舅家避难。寄人篱下，倍受歧视，因着避难“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而未能象过去那样感受到一种亲情间的温情，这在鲁迅无异于侮辱，这些遭际让他看清了上层社会的丑恶、冷酷、虚伪,产生了对他们的憎厌之情。然而家庭的变故，也使得他有一个较长的在农村停留的时间(大约半年)，于是，他与“闰土”交上了朋友，而且看到了许多诸如“阿Q”、“小D”之类的佣工，像翠姑遭遇婚抢、惊吓落水而死的情景也曾亲眼目睹。仕宦之家由兴旺走向破败的经历，使他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而乡土人的热情与淳朴却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也让他初步了解了农民的疾苦。鲁迅自己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从小就手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正是这深刻的童年记忆使成年的鲁迅依然感到,“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3]中国农民的苦难以童年记忆的方式点点滴滴地注入了鲁迅的心中。这种悲郁忧思的情感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逐渐强化，终其一生，未曾改变，特别到他青年和中老年期，这种情感与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个人独特的人生体验、难以拂去的孤独感胶结在一起，而表现为一种炽烈无比的大爱大憎，韧长昂扬、永不休战的战斗豪情。

三、不同的教育与经验在以特殊的方式获得了关于中国乡村的不同程度的感受与印象后，以怎样的思想倾向来整合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离开三味书屋以前，鲁迅接受的是系统的中国传统教育，获得整体上的反叛意识，则是鲁迅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结果。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近代科学文明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如尼采哲学、达尔文进化论等，早年写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宣扬科学民主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旧道德、旧礼教的过程中，鲁迅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魄，将个人生命容入民族与社会整体。当时日本留学生澎湃的反清起义革命浪潮吸引着鲁迅的全部注意力，他将民族整体的生存发展和人的精神解放，看成是最神圣、最庄严的事业，看成严峻的不可或缓的历史任务。他的思想境界，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和家庭的狭小范围，站在了时代精神与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反抗情绪呈现为在冷静的外表包裹下对旧社会的深刻暴露，对封建势力吃人罪恶的无情控诉，以及对群众麻木愚昧的批判。鲁迅是肩负着启蒙的任务，带着对传统社会与文化彻底反叛的立场开始文学创作的。这种沉重的使命感，使鲁迅的小说带有一种特别的厚重与苦涩。《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第一篇乡土小说，也是他运用乡土小说投入社会文化批判的总体宣言和纲领。它以“毫不可惜其溃灭的决心，对旧制度做出了历史性的总判决”。[4](P22)受到迫害的狂人发现“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4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还发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接下手，”“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理装满着吃人的意思。”小说对封建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揭露令人发指。《祝福》中的祥林嫂一生受尽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的迫害，至死还带着对神权的敬畏和恐怖，人们也并没有因为祥林嫂的死而感到吃惊，一如既往，祝福四起。封建等级观念作为统治意识，产生出人民群众的愚昧迷信、麻木冷漠和对于权势的敬畏和顺从。小说的主旨与作家的理性追求达到了一致。相对正规系统的现代教育、对中外文学艺术资源的广泛而充分的占有、学习与借鉴，形成了鲁迅潜在的、充满自信的、敢与传统对抗、坚信胜利的优越感，形成了鲁迅开阔的视野、开放性的把握，使他有能力站在融合中西文化之长的现代性立场上观照与审视具有数千年历史与传统的乡土中国。

鲁迅特殊的文化底蕴，生活经历，特殊的与文学结缘的方式、特殊的对乡村社会关注原因，都深刻影响了他笔下的乡村图景与面貌，和他对乡村人生存状态与命运沉浮的感受、理解方式，影响了他对中国乡村文化的基本姿态，使其小说创作在整体上呈现出解构的倾向。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1卷) [N].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毛德信等译.诺贝尔奖颁奖演讲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3]鲁迅全集(第7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杨义.鲁迅小说综论[M].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